

环东海文明互动与 东亚区域格局研究

陈国灿 于逢春 主编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国家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资助

环东海文明互动与 东亚区域格局研究

陈国灿 于逢春 主编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东海文明互动与东亚区域格局研究/陈国灿, 于逢春主编.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103-2070-5

I. ①环… II. ①陈… ②于… III. ①中外关系—文化交流—研究—东亚 IV. ①G125 ②G131.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2565 号

环东海文明互动与东亚区域格局研究

HUAN DONGHAI WENMING HUDONG YU DONGYA QUYU GEJU YANJIU
陈国灿 于逢春 主编

出版: 中国商务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东后巷 28 号 邮编: 100710
责任部门: 商务与法律事业部(010-64245686)
网址: <http://www.cctpress.com>
邮箱: cctpress1980@163.com
排版: 浙江大春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6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3-2070-5
定价: 98.00 元



凡所购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总编室联系。(电话: 010-6421224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盗版侵权举报可发邮件到本社邮箱: cctp@cctpress.com)

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几点思考(代序)

陈国灿

建设区域共同体是当今世界合作与发展的潮流。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大洲不同地区大多建立起了形式不一的区域合作组织和共同发展机制,诸如欧盟、东盟、阿盟、非洲统一组织、太平洋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等,就连矛盾与冲突不断的南亚也开始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这些不同类型和形式的区域共同体与国际组织,在协调国际关系和推进各国交流、合作与共赢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就东亚地区而言,建设区域共同体,推进区域合作与发展,也是东亚各国和各地区谋求共兴共盛的迫切需要和现实路径。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和迅猛发展,东亚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区域国际关系和秩序持续动荡。可以说,构建地区共同体,形成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有效机制,已成为化解东亚区域矛盾和冲突,谋求共同兴盛和繁荣的现实趋势。

正是由于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基于区域发展的实际需要,构建区域共同体和合作发展机制已越来越成为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共同愿望,要求积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呼声也日益高涨。2001年,韩国领导人建议将东盟“10+3”领导人峰会发展成为包括政治、经济、安全诸领域在内的东亚共同体和区域合作机制;2004年,在东盟“10+3”领导人会议上,与会国家作出了未来建立东亚

共同体的约定。在2005年的东盟“10+3”会议上，与会国家又重申了共同致力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2009年，在上海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上，中国政府表示将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日本官方也首次表示，希望这一构想经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后，能在不太远的时期内得以实现；同年，中国领导人在访问日本前夕再次重申，构建东亚共同体和实现区域合作应成为中日两国共同推动的目标。

然而，在当今国际形势和地域格局下，建设东亚区域共同发展组织却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阻碍，其中既有东亚各国民族主义情绪趋于高涨的牵制，又有区域内领土和主权纠纷呈不断加剧之势的影响，还有区域外部势力的插手和阻挠。在这种情况下，要克服当前各种困难，加快东亚区域共同体建设，推进区域合作的不断发展，必须转变思路，根据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围绕文化和海洋两个基点来展开。

首先，共同的文明传统和文化共性是构建东亚区域共同体、促进区域包容与合作的重要前提。从历史角度看，东亚地区有着共同的文明基础和相通的文化认知。通过彼此交流与融合而形成了“东亚文化圈”，东亚各国和各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具有以儒学为核心的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形成了诸多同质和相近的文化特性。尽管近代以来东亚地区内忧外患，恩怨沧桑，维系区域文化体系的认同基础逐渐削弱，甚至呈现各国在文化上分道扬镳的趋势。但就整体而言，东亚地区仍具有共通、共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基础，在文字、文化底色乃至族群等方面有着很多相近或相似之处。通过追求共同的文化认知，强化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化解东亚区域矛盾和冲突，形成谋求共同兴盛和繁荣的区域主流意识。

其次，海洋是推进东亚区域共同体建设和加强区域合作的有效载体。在东亚文化共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海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以海洋为纽带实现的，在东海、黄海乃至日本海上，形形色色的文化群体东渡西进，他们将华夏文化传播到异域。可以说，历史上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以海洋为载体实现的。21世纪是人类进一步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新时期，海洋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联

系纽带和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合作的重要舞台。当下借助文化共性来探寻东亚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不可避免地需要将视角转向海洋，并期以海洋为中心，在更广阔的领域探寻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路径。

进一步来讲，围绕文化和海洋两个基点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一方面，需要针对当前东亚地区的实际形势及其特点，在挖掘、传承、发展区域文化共性的基础上，以文化相通化解对立情绪，增强共识，着眼未来，谋求东亚地区的共同发展和持久和平；另一方面，依托海洋深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兴。具体需要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重振海洋文化共同体。通过海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进东亚文化圈的历史复兴与当代发展；二是强化海洋经济共同体。积极开展海洋经济合作，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及其可持续发展；三是形成海洋命运共同体。通过积极构建合理、稳定的区域海洋秩序和国际关系，以及各国和各地区共同发展的有效机制，推进环东亚海洋圈的共同兴盛和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

目 录

上篇 文明互动与文化交流

宋朝海商与中日关系	陈国灿 3
元代浙江港口与海上丝绸之路	刘恒武 马 敏 18
明清时期闽人与琉球交往考叙	赖正维 34
壬辰战争背景下中朝地方和民间一次儒学文化的深度交流	
——以鲁訢《锦溪集》和《锦溪日记》为中心	刘永连 57
清前期(1684—1784 年)东南沿海	
与台湾的贸易往来	王兴文 陈 清 74
中国篆书书法与江户时期日本	
——以泽田东江《篆说》为中心	曹 悦 84
锁国时期中日两国对外贸易中的输入品结构	
——以广州、长崎为对象	刘 钦 张晓刚 111
晚清中日间轮船航运与东亚交流	松浦章 145
作新社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态势	付建舟 156
东北亚区域视野下近代外国记者在华活动述论	宋铁勇 166

下篇 地缘关系与区域格局

东鯢考：4 世纪前的东亚海域世界	陈博翼	177
明嘉靖三十七年琉球册封使吴时来的秘密使命与明琉关系	年 旭	199
明清鼎革以降中日韩三国“华夷观”演变与“华夷秩序”再构筑	于逢春	220
从汪楫《使琉球杂录》《中山沿革志》看清初中琉之交流与关系	李圣华	251
略论李鸿章近代前期的对日主张	陈可畏	270
清同治年间日本侵台与海防论争之起	刘石吉	279
满铁铁路自警村移民初探	李淑娟	296
东亚国际关系背景下琉球(冲绳)的国家认同	徐建新	315
修宪运动背景下自卫队参与 PKO 制度之演变	张晓刚 邹圣婴	328
日本安保法制的“光”与影及对我国海洋安全立法的启示	陈根发	341
东亚海洋共同体构建	夏立平	352

上篇

文明互动与文化交流

宋朝海商与中日关系

陈国灿

一、宋朝海商群体的壮大

历史上,海商是伴随海上贸易的兴起而出现的。在中国古代前期,对外贸易的重心在西北内陆,主要通过“丝绸之路”展开

着区域社会经济在长期开发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走向繁荣，特别是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活跃，经商逐利风气愈盛。时人感叹地说：“今世积居润屋者，所不足非财也，而方命其子若孙倚市门，坐贾区，频取仰

营舶货”^①。第二，有官僚贵族。虽然宋政府明令禁止在任官员经营贸易，规定官吏不得“苟徇货财，潜通交易，阍出徼外”，也不准“遣亲信于化外贩鬻”

入贩贸纱帛、海货”^①。第四，有部分僧道人员也加入海商的行列。如杭州僧人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②；《夷坚志》三志己

一方面,宋王建立后,一直面临周边民族政权的威胁和内部统治问题的困扰,无暇也无力像汉唐两代那样大力追求四夷宾服、万国宗主的地位,因而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收缩对外政治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在宽平六年(唐昭宗乾宁元年,8

不满，决定不予理睬。“诸卿定申大宋皇帝付孙忠献锦绮事，不可遣答信物。”^①直到承保四年（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才以主管贸易的大宰府名义回复。次年初，孙忠与日通事僧仲回一起回到明州。当地官员报请朝廷：“得其国大宰府牒，因使人孙忠还，遣仲回等贡色段二百匹、水银五千两。以孙忠乃海商，而贡礼与诸国异，请自移牒报，而答其物直，付仲回东归。”^②日本政府想竭力回避对宋的朝贡关系，故拖延多年才回复宋方；宋政府则力图确立对日的宗主国地位，不满日方移牒己方贸易机构市舶司的做法，故此次两国以海商为信使的交往没有结果。

宋神宗元丰元年（日承历二年，1078年）十月，孙忠再次携带宋廷官牒和礼物赴日，结果进一步引发日本政府的疑虑，认为两国“和亲久绝，不贡朝物，今日频有此事，人以成狐疑”^③。元丰三年（日承历四年，1080年），就在日本政府对是否接受宋朝牒书犹豫不决的时候，宋廷让另一海商黄逢带第三份牒书赴日，表面上是询问孙忠何以迟迟不归，实则是催促日方尽快回应宋廷的要求。次年，宋廷再次派海商黄政（王瑞垂）赴日递交第四份牒书，要求日方将孙忠等人“请疾发遣，回归本州，不请留滞”^④。面对宋廷接二连三地送来牒书，日本政府仍坚持对宋朝敬而远之的立场，决定给予礼节性回信，并由宋商捎带回去。

北宋后期，宋廷虽继续通过海商向日本传递国书，却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及宋室南渡，面对北方金王朝的进逼，南宋政府一度无暇顾及与日关系。直到宋孝宗时期，南北对峙的局面趋于稳定，而日本在经历“平治之乱”后，平氏家族掌控了朝政，开始调整“锁国”政策，对宋日贸易由控制转为鼓励，宋廷

①（日）《百练抄》，《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五，东京：日本东京都档案会，1964年，第340页。

②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一《日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37页。

③（日）《百练抄》，《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五，东京：日本东京都档案会，1964年，第323页。

④（日）《水左记》，《太宰府天满宫史料》卷五，东京：日本东京都档案会，1964年，第356页。